

# 晚清民初:鲁迅汉语实践的“四重奏”

文贵良

**摘要:** 晚清民初,鲁迅的汉语实践表现为“四重奏”。《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准白话译述,初步显示鲁迅把握白话的能力,同时也显示出白话与文言、汉语欧化的纠结。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域外小说集》中文言短篇的翻译,使得鲁迅形成“语言之伪”的观念。短篇小说《怀旧》的创作以及他的文言书写,表明鲁迅操控文言的自如状态,同时也表明白话在文言中的发芽。辑录校勘古籍,提升鲁迅精确地把握汉字韧性的能力,还影响着鲁迅后来文本形态的结构。这些语言实践,为鲁迅创作白话小说准备了必需的东西。

**关键词:** 鲁迅; 汉语实践; 文言; 准白话; 语言之伪; 辑录校勘

**作者简介:**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 glwen155@163.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项目编号: 08BZW051]阶段性成果。

**Title:** Lu Xun's Quartet of Chinese Practic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Lu Xun's Chinese practice could be depicted as a quartet. Lu Xun's pro-vernacular 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 of *Travel on the Moon* and *Travel Underground* not only demonstrates his ability to use vernacular (*baihua*) but also exposes his entanglement among vernacular, classical Chinese (*wenyan*) and Europeanized Chinese. Lu Xun's idea of the unreliability of language was formed after he listened to Zhang Taiyan's exegesis of *Explaining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Shuowen Jiezi*) and his explanation of translating foreign fictions into classical Chinese. Lu Xun's mastery of classical Chinese can be seen in the short story "Nostalgia" and other literary works, but seeds of vernacular also can be seen. Compiling and collating Chinese classics helped to sharpen Lu Xun's keen sense of the tenac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had influenced the structure of his later textual topograph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se practices with Chinese language prepared Lu Xun for his vernacular writing.

**Keywords:** Lu Xun; Chinese practice; classical Chinese (*wenyan*); pro-vernacular; the unreliability of language; compilation and collation

**Author:** Wen Guiliang,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glwen155@163.com

胡适、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学一事,经钱玄同的反复叙说,拯救了处于绝望中的周树人,创造出反抗绝望的鲁迅;白话文学又因鲁迅异质绝伦的白话表达而得以发展和提升。这一事实让人不禁思考:该如何描述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汉语实践?如果按照时间顺序从小时候抄古文开始勾勒,虽能显出发展的脉络,但可能过于繁琐;如

果按照文言习作、白话翻译、文言翻译的类别来描述,虽然注意到了汉语实践的语言构成,但可能淹没发展的脉络。因此笔者采取以时间为序、以关键事件为中心的方式,这样既可以显示发展脉络,又能关注汉语构成。具体说,以《月界旅行》(1903年)、《地底旅行》(1906年)为中心,描述他早期的准白话译述;以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

和翻译《域外小说集》(1909年)为中心考察他文言翻译的体验;以文言小说《怀旧》(1913年)为中心考察他文言写作的得失;以他整理、辑录、考订古籍、古碑为中心考察他对汉字韧性的敲打以及文本形态的结构。周树人在晚清民初汉语实践的这—“四重奏”,孕育了白话文学家鲁迅的诞生。

## 一、《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 准白话译述

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1903年)中写道:“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鲁迅译文集》1:4-5)。

鲁迅翻译《月界旅行》的策略属于晚清翻译界的“译述”,一方面采用长篇章回体的形式;一方面采用“俗语”,参用文言。这样的译述策略既省略篇幅,又趋合读者的习惯,蕴涵着鲁迅以“科学小说”开启中国民智的启蒙愿望。《月界旅行》中,第一回和第二回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基本为明清小说的书面白话,而从第三回开始,文言句式逐步增加,至第八回几乎全篇都是文言。《地底旅行》略有不同,全书的叙事语言采用浅显文言,人物语言采用书面白话。所以,这两书的译述语言笔者称之为“准白话”。这样的准白话大体与现代汉语相似,不过像“簇齐的坐着”、“静悄悄的只待社长”这样的短语中两个“的”在现代汉语中用“地”。<sup>①</sup>有时也会出现如“诸君”这样在晚清演说和白话报纸中常用的呼告语。

鲁迅的准白话准到什么程度?笔者采取一种统计的方法,比较“的”、“了”和“是”在不同文本中的出现频率。这三个词语在白话中属于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月界旅行》第二回约2500字,“的”98次,“了”21次,“是”41次,三字约占该回6.4%。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回约5000字,“的”104次,“了”79次,“是”35次,三字约占4.4%。梁启超所译《十五小豪杰》第一回约2800字,“的”37次,“了”38次,“是”26次,三字约占3.6%。从使用这三个字的次数大致可以看出,鲁迅的准白话程度相对要高。《月界旅行》第二回中,“的”作为助词后接动词的用法有8次,如“满

满的塞个铁紧”,“簇齐的坐着”。这是明清白话中“的”、“地”不分的表现。“的”作为名词之前的助词出现,如“自由的弊病”、“月界的重量”等,最后一种用法最多,共57次,而“的”字后接双音节词的用法共36次。另外,“的”还出现在“是……的”的结构中,“的”作为语尾词出现,如“呼的,叫的,笑的,吼的”。

鲁迅所说“参用文言”,适应于最初几回,后来就变为以文言为主、参用白话。《月界旅行》从第三回开始,文言味越来越浓。第五回《闻决议两州争地 逞反对一士悬金》叙述的人称有了变化,前四回中无论是说话还是叙述都用“我”、“我们”,第五回则“我”、“我们”与“余”并用。第八回则“余”的次数占绝对优势,“我”和“我们”仅出现6次,而“余”高达32次,另“吾友”、“吾人”和“吾曹”也有9次。与第二回相比,第八回中“的”、“是”和“了”出现明显下降。这回约4000字,“的”56次,“是”9次,“了”5次,三字仅占1.8%。有时直接引用中国人的文言语句,比如写军人渴望战场,鲁迅引入陶渊明的诗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鲁迅译文集》1:8)。《月界旅行》第二回《搜新地奇想惊天 登演坛雄谭震俗》中引用了严复的句子“自由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鲁迅,《鲁迅译文集》1:11)。其余如“行人接踵,车马如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种对称、整齐的文言语句在增加语言的庄重典雅的同时,更多地会削减语言的灵活性和表现力。有时在一句话中,白话文言扭结在一起,如“诸君,你想!偌大一个地球,为什么独有美国炮术,精妙一至于此呢?”(鲁迅,《鲁迅译文集》1:7)。“麦思敦更是欣喜欲狂,忽跃忽踊,仰视苍苍的昊天,俯瞰杳杳的地窟,一失脚,跌入炮孔中去了”(鲁迅,《鲁迅译文集》1:44)。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虽然是白话文言合用,其中已经开始汉语的欧化,表现在新词语的运用和科学数据的表达。汉语欧化首先表现在汉语新词的采用。汉语新词是指晚清民初时期中国人、传教士或者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著作过程中创造的汉语新词或者灌注了新意的汉语词汇。鲁迅采用的新词语中有一部分是音译名词,主要包括地名、人名和事物的专名,如亚美利加、拔尔祛摩、

麦思敦、洛克、波留、白兰地……新名词中更多的是那种意译西方名词的汉语词汇,如:爱力、半点钟、报告、抵抗力、第一速力、地理、地图、独立战争、电报、电线、电气、都市、感触点、工人、工业、工资、合同、合众国、化学、会议、机器、机械、机械力、机械师、机械学、激发力、进化、论理学家、平均点、汽船、汽灯、穷理学家、热度、社长、社员、神学、实验、弹拨力、天文、天文家、天文学家、吸力、显微镜、心理学、新闻、新闻纸、形势、性质、学术、血液元素、演说、要点、义务、邮局、运动、杂志、自由、照相、震动力、直径、自鸣钟、重力、总代理、宗旨、资本、组织、状态、望远镜、委员……

欧化的第二个方面是科学数据的表达:

此外还有一层紧要的,就是火药之机械力,凡火药一里得,(量名)计重二十一磅,燃烧起来,便变成气质四百里得。这气质又受二千四百度热力的振动,质点忽然膨胀,变了四千里得。如此看来,火药的容量,可以骤然增至四千倍,所以把炮孔闭住的时候,这里边激发力之强大,就可不言而喻了。(鲁迅,《鲁迅译文集》1:29)

## 二、《说文解字》课程与文言翻译: 语言之伪的隐性存在

1908年至1909年,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新小川町民报社的房子里,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据周作人的回忆,师生(“知堂”252)之间非常融洽轻松(“鲁迅”283)。鲁迅只是听了其中部分课程,他对这段听课的回忆不多。在章太炎死后,他更想念那个革命家的章太炎,而不是学问家的章太炎。<sup>②</sup>不过,鲁迅留下了两册听章太炎文字课的笔记,还有钱玄同和朱希祖也留下了比鲁迅更多的笔记,从这些笔记(王宁主持整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章太炎讲课的内容之丰富。章太炎据声韵、造字、字形演变,构建出一个语义不断滋生、转化的汉字场域,如用“天”与“颠”、“显”、“坦”、“祔”、“天竺”、“身毒”、“贤豆”等词构造了一个以“天”为中心的语义场域(王宁2)。在人们看来没有任何关联的汉字之间,竟然呈现一派

春天森林般的蓬勃生机,这怎不让人心情激荡呢?章太炎的《说文解字》课程对鲁迅的影响,一个众所周知的共识是鲁迅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喜欢写古文。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的作品有安特来夫的《漫》、《默》和迦尔洵的《四日》,如有这样的构造“作野咲(笑)者曰”、“雪华如鍼(针)”。鲁迅曾经用文言翻译过《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前三节,从用字看,很有可能译于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期。文中如“十年不勸”用“勸”而不用“倦”,“如彼莽蠹”用“蠹”而不用“蜂”,“黄耆面而立”用“耆”而不用“老”,“不藏欧噉”用“噉”而不用“吐”,“咲泣呻吟”用“咲”而不用“笑”(鲁迅,《鲁迅译文集》10:773-78)。对古文字的特别喜好当是在鲁迅聆听章太炎课程之后。其实,鲁迅写古文的兴趣并没有因翻译域外小说的暂停而消失。他1908年回国后任教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他为人体生理学课程所编的讲义——《人生象数》中,运用了一批学科新词,如生理学、动力学、力学、运动、消化、循环、呼吸等。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用古文代替科学译名,如:Cellula日译为“细胞”,他译为“么”;Textura日译为“组织”,他译为“腠”;Fibra日译为“纤维”,他译为“系”。于是就有了“么间质”、“腠学”这样的词语(鲁迅,“人生”101)。另外,生殖器官的有些名称鲁迅用原文,不翻译,或者也采用古文来书写,比如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表示男阴,用“系”表示精子(夏丏尊125)。

鲁迅改写古文,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文字游戏。章太炎的《说文解字》课程对鲁迅更重要的影响是鲁迅采用文言翻译域外小说,这改变了他译述《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策略,放弃了之前的准白话的译述,回归到了相对纯粹的文言翻译。最深层的是影响了鲁迅对语言本身看法,即对语言伦理的认识。所谓语言伦理指言说者使用言语的真伪。鲁迅在《说文解字》课程的笔记中,记载100个言部的汉字(言部99字,加詒恰好一百)。其中有16个字形容言语的虚伪和欺骗:

|           |        |
|-----------|--------|
| 諛: 诈      | 謏: 瞞   |
| 詖: 骗人     | 誣: 假话  |
| 譌: 说谎,说大话 | 誣: 俗骗字 |
| 詭: 以言引诱   | 讞: 说假话 |
| 誕: 大话     | 譌: 伪   |

說: 梦言与说谎近

謀: 欺

訐: 讒言为

詭: 詭詐

譏: 譏詬, 无耻也

調: 抵賴

汉语词汇用来形容语言之欺骗、诡诈、虚伪、大话何等丰富,这一词语群体显示中国古人对语言虚伪性表达非常重视,语言之伪成为中国人言说的某种根本特征。鲁迅听讲、笔记的同时也许没有意识到中国语言之伪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经过言语的反复强调与使用,也许如荣格所说的成为集体无意识。但是,《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过程无形中可能强化了这种潜在的集体无意识。安特莱夫的《謾》和《默》几乎是语言的两极,謾即瞒,瞒即骗的方式之一。默即沉默,无言无声。

安特来夫的《謾》以深刻描摹人物心理见长,“吾”把女友的话视为“謾”,“謾”是女友的言说方式,日常的欺骗行为。“謾”首先是一种言语行为,“汝謾”之“謾”,意味着在“吾”的意向中,“汝”的言说是对某种在“吾”看来“真”的有意遮蔽或扭曲。“吾”之“低语”被“汝”责怪为“狂呼”,这种言语的扭曲刺激着“吾”对“謾”的想象。“吾”把作为有声的行为方式的“謾”,在抽象中幻化为“鸣如短蛇”之象。“鸣如短蛇”不同于“如短蛇”之“鸣”,前者重在“鸣”发声的动态过程,后者重在“鸣”作为声音的结果。“鸣如短蛇”那是一种怎样的有声行为?有人听过蛇的鸣叫吗?那不可能是蛇的嘶嘶声。蛇,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是可看做背叛者的文化符号。蛇有言词的说话,可以蛊惑夏娃,但蛇的没有言词的鸣叫,会使人惊悚而战栗。小说中反复叙写到“鸣如短蛇”的情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有“啞”作“滞声”,压抑而且阻碍,断断续续,诡异中有嘲讽。随着故事的发展,“謾”也随之变形,“謾”与“吾”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当女友爽约不来时,“謾”更加活跃,“吾不知胡以时复大乐,破颜而啞,指则拳曲如鹰爪,中执一小者,毒者,鸣者,——厥状如蛇,——謾也。謾蜿蜒夺手出,进啖吾心,以此啖之毒,而吾首遂眩。嗟夫,一切謾耳!”(鲁迅,《鲁迅译文集》1:154-55)。

因此,“謾”的咬啖让“吾”无法忍受,“吾”把所有的“謾”都归结于女子,于是采取杀女灭謾的策略。“吾”刚刚杀死女子时感到大欢喜,以为女死謾灭,自以为“福人”。但动物园里豹子来往于狭窄笼子的困境,反而让“謾”变得强大而且沉

重。这“謾”是何等强大呢?“謾”覆盖着整个世界。更可怕的是,“謾”变得更加狠毒,由原来的“短蛇”变为“巴蛇”,巴蛇如果类似于中国古代《山海经》中能吞象的修蛇,其吞噬力足够惊人;如果指非洲黑曼巴蛇(从鳞甲灿烂看,似乎不像),那其攻击性与致命程度足够摧毁人的生命。更可怕的是,“吾”被巴蛇咬后,已经中毒,“吾”的痛苦呼唤酷肖蛇鸣,叙事虽然没有明白说出其可怕的后果,但是“謾”随蛇毒侵入“吾”的生命是不可能。杀女灭謾的行为彻底失败,反而遭受“謾”更猛烈的攻击,“吾”的求诚意志也随之崩溃。“謾乃永存,謾实不死”(鲁迅,《鲁迅译文集》1:154-55),“謾”成为永恒的存在,永恒的力量,个人在“謾”面前,意志不堪一击。这使得他不仅震惊,而且陷入绝望之境。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中有一种张力结构:灭謾——求诚。“语吾诚”成为主人公自我意志最强烈的呼告。虽然,《謾》只是鲁迅的译作,无法坐实其内容与意义就为鲁迅所有。可是,“诚-謾”二元对立的语言结构,不仅回应着《说文解字》课程中那个言语之伪的集体性沉淀,而且还推动着鲁迅早期言说中的“真-伪”的发展。“诚-謾”结构中力量的失衡,“謾”的强大击溃“诚”的弱小,这把鲁迅引向语言伦理的一个极端:鲁迅对语言的不信任。

### 三、短篇小说《怀旧》与文言书写

鲁迅的文言书写如果从课对算起,则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他与周作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诗歌唱和(比如《祭书神文》),无疑也是文言书写。不过,这些还是在私人空间往来,鲁迅于留学日本初期撰写的《中国地质学略论》和编译的雨果的小说《哀尘》以及《斯巴达之魂》则可以看做鲁迅的文言书写在公共空间的第一次展示。他早期的文言书写整散结合,散句多,但句子不长;夹杂以四字结构的对称形式;用字准确且思路清楚,简洁有神。青年鲁迅的文言书写已有六七分功力。但因受到晚清书写风尚的影响,他有时会模仿梁启超的二分的整饬句式(《鲁迅全集》8:4)。<sup>③</sup>有时在译述中会改变叙事的人称,如《哀尘》(1903年)的人称有着晚清译述著作的特征,把原作者处理为叙事者,《哀尘》的叙事者即作者器俄。器俄对球歌特说“吾侪居今日”、“余惟歌‘霍散那’

而已”;对巡查说“设若知予名”,后又对巡查说“吾以吾目亲见之”;女子对巡查说“余未为害”;众女子对女子说“我齐可来访君”。由此可见,《哀尘》第一人称词语“吾”、“余”、“予”和“我”一齐出现。器俄称呼球歌特用“君”,巡查称呼器俄也是用“君”;叙事者称球歌特用“渠”,称呼那少年用“彼”,从人称来看,似乎很富有变化,但也可以看作鲁迅文言汉语的书面形态此时还没有对西语的表达采取积极的回应姿态(庚辰 165-70)。

《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诸篇足能显示青年鲁迅驾驭文言以说理抒情的娴熟本领。鲁迅用文言翻译安特来夫的《漫》、《默》和迦尔洵的《四日》,其语言内部的“摩擦”(木山英雄 231)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虽说《怀旧》整体上属于文言小说,但其文言并不纯粹。小说中出现的白话就像从头颅骨钻出的青草,胀裂了文言的整体性。秃先生作为私塾先生满口之乎者也,可秃先生说了小说中唯一的一句白话“秃先生曰。孔夫子说。我到六十便耳顺。耳是耳朵。到七十便从心所欲。不逾这个矩了。[……]余都不之解”(周遑 1)。

其余人物如邻居富翁金耀宗、邻居王翁、佣人李媪乃至九岁的叙事者,他们的所有对白都为文言。难道这是鲁迅有意对秃先生的讽刺吗?鲁迅常常用人物语言的对照彰显说话者的身份,比如《孔乙己》中孔乙己“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文言道说反衬出他在白话短衣帮中的迂腐。《怀旧》中秃先生的白话言语也具有如此的叙事力量吗?可以先看小说中写富翁金敬耀不懂词语意思而可笑的一段话“如语及米。则竟曰米。不可别粳糯。语及鱼。则竟曰鱼。不可分魴鲤。否则不解。须加注几百句。而注中又多不解语。须更用疏。疏又有难词。则终不解而止。因不好与谈”(周遑 2-3)。

小说中这段话讽刺富翁金敬耀坐井观天,见识鄙陋。不过如果从中国文化传承来看,“注”、“疏”等构成了中国文化庞大而流动的语义阐释系统,这个系统的有效性在小说九岁叙事者身上遭遇了挫折。小说中开头写秃先生的课对,叙事者不知平仄为何物。秃先生说“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周遑 1)。这种文言阐释并没有在“余”身上奏效。也许秃先生用

白话阐释《论语》中孔子的言论,目的是让九岁小孩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假设秃先生有这样善良的教学意愿,但这愿望无疑落空了,因为“余都不之解”。因此,《论语》中的文言叙说与秃先生的白话阐释实际也是一种反讽。

《怀旧》叙事语言中,“吾”8次,“予”19次,“余”16次,“我”6次,很明显文言第一人称词汇(“吾”、“余”、“予”)出现频率高,占有绝对优势。作为白话第一人称主语代词的“我”好像只是偶尔出现。不过,人物语言中的情形却截然不同。人物对话中,第一人称词语共出现23次。<sup>④</sup>其中,“吾”3次,都是所属格的形式,即“吾母”、“吾村”和“吾脑”;“余”1次,为主语,“我”19次,其中作主语10次,所属格7次,宾语2次。很明显,人物对话中,“我”的次数占绝对优势。四个第一人称代词同时进入叙事,这一现象非常特殊。如果认为这是鲁迅追求人称代词的灵活变异,未免太过牵强;如果认为这是鲁迅完全不懂叙事视角的统一性而导致的混乱,未免又太过简单。“我”是一个高频率的白话词语,就整篇小说来看,“我”共出现25次,在四个代词中出现次数最多。之前鲁迅译述《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白话操练所用的白话,不知不觉在鲁迅的语言中沉淀并呈现。同时,“我”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不仅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再次使用并获得成功,而且还将延续到鲁迅《呐喊》、《彷徨》乃至他的全部白话文写作。

巴人曾在《鲁迅的创作方法》中指出鲁迅语言艺术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注意语气的自然”(1186)。“《怀旧》中的对话,虽用文言写出,但非常适合语气,这是古文的一大解放”(巴人 1187)。巴人所说的“语气”当指口语的语气。鲁迅借助标点符号来展示语气的波动起伏。如《怀旧》的结尾:

“啊!雨矣。归休乎。”(不肯一笔平钝故借雨作结解得此法行文直游戏耳)李媪见雨。便生归心。

“否否。且住。”余殊弗愿。大类读小说者。见作惊人之笔后。继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则偏欲急看下回。非尽全卷不止。而李媪似不然。

“噢!归休耳。明日晏起。又要吃

先生界尺矣。”

雨益大。打窗前芭蕉巨叶。如蟹爬沙。(状物入细)余就枕上听之。渐不闻。(三字妙若云睡去便是钝汉)

“啊!先生!我下次用功矣。[……]”(余波映照前文不可少)

“啊!甚事?梦耶?我之噩梦。亦为汝吓破矣。[……]梦耶?何梦?李媪趋就余榻。拍余背者屡。

“梦耳。[……]无之。[……]媪何梦?”

“梦长毛耳。[……]明日当为汝言。今夜将半。睡矣睡矣。”(周遑 7)<sup>⑤</sup>

这段话中,括号里的内容为恽铁樵的评语,多赞扬之词。标点符号的引入改变了现代汉语的造型。王风曾经精彩地分析引号的使用,指出“这一书写形式的引入使得行文多变,场景组织空前灵活”(王风 8)。

鲁迅的文言文写作也非常精彩。他的《“乐闻于斯”的回信》戏仿《筹设孔教会青年会宣言》和《上海孔教会青年会文缘起》的四六文体,掺入洋文字母,不时引来信中的语句,不忘俗语的加盟和文言长句的串演,以四六文体拆解四六文体,堪称文言文的高手。

#### 四、辑录校勘古籍:汉字韧性的 敲打与本文形态的结构

郑振铎曾经高度赞赏鲁迅的辑佚工作,把鲁迅的辑佚工作、创作及翻译称为“三绝”。郑振铎认为辑佚工作“需要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阔的披览”,而且“辑佚”的工作往往是“文艺复兴”的先驱(960)。他关心的是鲁迅对文学史资料的辑佚,所以他认为《古小说钩沉》最为重要。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及辑录校勘古籍对鲁迅的语言艺术产生的影响。

鲁迅辑录校勘古籍成为他锤炼文字原矿石的方式,其功能有三:

第一,敲打汉字的韧性,追求用字的绝对准确。

鲁迅校汉《校官碑》中“君位既重”一句中的“重”综观宋代洪适、元代单禧、清代王少军等六

人的考订,然后下一结论,这种考订不仅要仔细观察汉字字形,而且还要细心揣摩汉字字义(《鲁迅全集》263)<sup>⑥</sup>。又如鲁迅在《〈吕超墓志铭〉跋》中考朝代,考月日,然后对墓志中的“隋郡王”中的“隋”作一说明,既然这个墓志铭刻于隋朝之前的晋代,那么这个“隋”就不是因隋文帝改。鲁迅引宋代洪适所编《隶释》、晋代夏侯湛所撰《张平子碑颂》、宋代刘球所著《隶韵》诸书对“隋”的使用,下一断论“作随作隋作隋,止是省笔而已”(《鲁迅全集》8:68)。省笔在于方便实用。1924年鲁迅在《〈嵇康集〉序》中叙及不同版本之间字词的修改,总结了几种情形,第一种刻本比集本好,如“遊”为“游”;第二种集本比刻本为长,如“饑”为“饥”;第三种是虽为异文但两者都能说得通,如“迺”与“乃”(《鲁迅辑录古籍丛编》4:4-5)。略举两例如下:

“邕邕和鸣。”鲁迅校《艺文类聚》九十二引作啾啾。“顾盼俦侣。”鲁迅校《类聚》作眄,黄本及《诗纪》并作眄。

鲁迅把不同的字置于同一句子的相同位置,从而考量两者产生的意义域,不仅有一种文字的意趣,由此也得到汉字的硬度与韧性。

鲁迅民元后“沉默期”辑录古籍的经验与之后的文学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野草》的《墓碣文》至少在文本形态就与古碑、墓志有着密切的关联。又如他辑录校勘古籍的经验可能形成了《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

鲁迅回忆自己的小说创作时,仿佛毫不在意与辑录校勘古籍的关系“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话”(《鲁迅全集》7:4)。从“抄古碑”一下子跳到“做白话”,好像干干净净。而人们在探讨《狂人日记》的诞生时往往侧重外来因素,比如戈理《狂人日记》的日记体裁。有学人曾经也以《新青年》上翻译文的“序言+正文”的文本形态说明《狂人日记》文言小序的由来(王桂妹 79-82),其实翻译文的序言往往只是孤立的说明文字,不会参与正文的建构。鲁迅留日时期译述的《斯巴达之魂》也是“序+正文”的结构(全用文言),其序就不参与正文的结构。《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之所以充满魅惑,因为它与作为正文的白话日记之间沟壑纵横,需要读者的想象去填满。笔者所关注的,在于,日记正文的文本构型是如何形成的。其中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语颇错杂

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涵盖了“记中语误”、村人名字无关大体等内容;一条是“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第一条讲语言造型,第二条讲文本结构,依次分析如下。

人们往往根据文言小序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之语,在狂人的日记中寻找诸如易牙蒸子给桀纣吃、把“徐锡麟”写成“徐锡林”等表达,从而断定狂人即真正的狂人。那么鲁迅如此构造的原初动因是什么?

鲁迅的古籍辑录显示语言错讹成为一种文本记录的常态。鲁迅比勘、校对嵇康文集的多种刻本和抄本时,归纳出几种语言错讹现象:第一种被鲁迅称为“义得两通”的字词,即不同版本中用不同的字,但两种说法都可以说得通,鲁迅用“各本作某字”的方式表达。这类字在《嵇康集》中非常多,比如“矣”作“涣”、“陵”作“凌”、“烦”作“繁”、“襁褓”作“緇縵”。第二种是“譌夺/譌挽字”(《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31)。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譌”,即错字。“𠂔”譌“𠂔”、“擊”譌“繫”、“晋”譌“唇”、“止”譌“上”、“当”譌“常”、“夫”譌“天”、“通”譌“遇”。一种是“夺”,即夺去,该有某字而没有即谓之“夺”。第三种是两字颠倒,不影响字义。比如“老庄”与“庄老”、“加少”与“少加”、“不目”与“目不”、“斧斤”与“斤斧”。还有一种语言错讹现象值得特别注意,即一个人名有时有几种写法。鲁迅怀疑《谢承后汉书》中“陈长”和“李茝”(《鲁迅辑录古籍丛编》3:170-71)为同一个人,因为对两人的记载基本相同。<sup>⑦</sup>《嵇康集》中“刘零”即“刘伶”(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13)。在《会稽典录》的《周日禺》一文的校释中,鲁迅比较《吴志》、《魏志》和《汉书》关于周日禺、周昂、周昕三兄弟的故事记载,下一断语“盖日禺兄弟三人,皆与孙氏为敌,故诸书记录,往往不能辨析也”(《鲁迅辑录古籍丛编》3:272)。

“余”所认为的狂人日记中的“错杂”之语,主要有如下形式“娘老子”写成“老子娘”,属于词序颠倒。“徐锡麟”写成“徐锡林”,属于人名书写错误。“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这里的“老子”应该为“儿子”,因为说这句话的女人正在打她儿子,可用“天啊”、“妈呀”等呼唤词语代替,用“老子”非常奇特。“我出了一惊。”应该为“我吃了一惊”。“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

公’上的,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恰恰反对用人肉来治疗痼病。“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易牙是春秋时期齐国人,他蒸儿子给齐桓公吃,而不是给桀纣吃。

如果把鲁迅校勘古籍总结的语言错讹与《狂人日记》中的“错杂无伦次”之语相比,其形态几乎全部类似。至此大致可以断定,《狂人日记》的“错杂无伦次”之语的构造源自鲁迅校勘古籍时的语言体验。自然,我不能简单地以巧合敷衍了之,其中必有某种潜在的功能。另外,我也不打算把历史上不同版本之间的语言错讹作为一种合理性存在,从而勉强地论证狂人日记的“错杂无伦次”之语是如何正当。那么两种之间的不同在哪里?当古籍版本之间的语言错讹转化为小说《狂人日记》的“错杂无伦次”之语时,其功能发生了逆转。小说中狂人的“错杂无伦次”之语消除了古籍中语言的实有性,即:在古籍中刘伶只可能是刘伶,不能是刘零;但小说中说徐锡麟,说徐锡林,甚至说徐锡霖,均可。《狂人日记》中,“徐锡林”、“易牙”、“纣桀”等只是符码。重要的是符码的功能,而不是符码的实指。这些符码表达的是历史吃人的久远与连续。所以“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何谓“无关大体”?“大体”指的应该是历史吃人和狂人发现自己也是吃人者这样的惊天霹雳之事。“无关大体”的村人人名因丧失功能而被删除。既然“徐锡林”、“易牙”、“纣桀”等是符码,为什么不直接写成“徐锡麟”、“易牙蒸子给齐桓公吃”呢?从符码的象征功能看,历史的真实姓名与人物更容易因坐实而限制符码的象征外延,相反,一个虚构的符码更具有普遍性。另外,古籍版本之间的语言错讹内含一种对学者的吸引力,同理,《狂人日记》的“错杂无伦次”之语蕴藏着对读者的吸引力。

如果说“错杂无伦次”之语作为符码,那么“荒唐之言”就是话语。符码的功能只有在话语中才会绽放。话语把符码的功能提升为陈述,从而实践意义。作为话语形态的“荒唐之言”,鲁迅辑录古籍时就见识过。如《会稽典录》的《朱朗》篇叙述朱朗杀仇人儿子一事带着绝代赞赏的语气,而称赞其“孝勇”(《鲁迅辑录古籍丛编》3:292)。鲁迅的校勘按语“传文零散,本末不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292),无异于斥责其为

“荒唐之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事实不清楚,二是价值取向颠倒。“荒唐之言”一般逸出常理的篱笆,走向极端。《狂人日记》中的“荒唐之言”比比皆是,比如“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从易牙蒸子,到徐锡林被吃,狼之村的恶人被吃,只是几个虚虚实实的吃人例子,但是狂人用几个关联词语联结起来,从而推向极端,产生了一种整个历史吃人的感觉。鲁迅用“荒唐之言”作剑刺向“衣冠楚楚”的“历史”。

文言小序的“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虚构了一个“原本”与“录本”的结构,读者看到的狂人日记正文是叙事者“余”“撮录”狂人的日记原本而成。这个结构的最初起源可能来自鲁迅辑录古籍的经验。

虞预所撰《会稽典录》二十四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经籍志》均有记载,《宋史·艺文志》已无,只是宋人著作中时有称引。鲁迅推测“疑民间尚有其书,后遂湮昧”(《鲁迅辑录古籍丛编》3:243)。鲁迅确信《会稽典录》实有其书。于是他“今搜辑逸文,尚得七十二人。略依时代次第,析为二卷。有虑非本书者,别为存疑一篇,附于末”(《鲁迅辑录古籍丛编》3:243)。鲁迅“搜辑逸文”显然不能彻底恢复《会稽典录》的原本形态。他所成的《会稽典录》不过是拼制的残本,远不能成为定本。但他搜辑逸文、编次二卷,又存疑一篇的过程中,肯定充满着对原本的想象。

鲁迅搜集会稽郡先贤遗著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其方法是“刺取遗篇,彙为一裘”(《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235),以“诸书众说”“参证本文”(《鲁迅辑录古籍丛编》3:236)。比如《董昆》一文仅十余字(《鲁迅辑录古籍丛编》3:238),鲁迅引《谢承后汉书》、《会稽先贤像赞》、《书钞》、《御览》四种书中有关条文参证,最后下一结语“案此文譌夺甚多,无以申正,今第依录,尚得见其大略”(《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239)。

鲁迅曾经自述校正《嵇康集》的方法:以明代黄省曾刻本《嵇中散集》、汪士贤刻本《嵇中散集》、程荣刻本《嵇中散集》以及张溥、张燮刻本互相比勘,再取《〈三国志〉注》、《〈晋书〉注》、《〈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印宋代尤袤

刻本《文选》李善注、尤袤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纪》、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纘宗刻本《艺文类聚》、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安国刻本《初学记》等书进行校对,存其异同(《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4)。其唯一的目的在于“排摭旧校,力存原文”(《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4)。

《会稽典录》的虞预原本与鲁迅辑成的残本之间,《董昆》的正文与抄文之间,《嵇康集》中的原文与抄文校文之间,都留下遥远而宽阔的想象空间。鲁迅力争通过自己的辑录校勘恢复到“原本”的形态,实际上那个“原本”只成为鲁迅校勘的想象,根本无法恢复。“原本”与鲁迅的“辑录校勘本”之间形成一种“互文性”。《狂人日记》的结构与之何其相似。“撮录”类似“辑录校勘”,狂人所写的日记类似“原本”,呈现的狂人日记正文类似“辑录校勘本”。

#### 注释[Notes]

① 助词“的”和“底”的区分,在民国时期一直没有彻底分清楚,不过朝着彻底区分的方向发展。

② 周作人对章太炎的看法“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也可见周氏兄弟见解不同之趣味。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253。

③ 如“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参见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4。

④ 情形如下:“我到六十便耳顺”,“我已遣底下人[……]”,“我家厅事小”,“我且告[……]”,“我不留守[……]”,“大王食我”,“我底下人”,“我家乞食者”,“我盖二十余矣”,“我才十一”,“时吾母挈我奔平田”,“我则奔幌山”,“吾村”,“我适出走”,“我两族兄”,“我走及幌山”,“我村人”,“我村人”,“余曾得一明珠”,“吾脑”,“我下次用功”,“我之噩梦”。周遑(鲁迅:“怀旧”,《小说月报》第4卷1号,1913年4月25日)。

⑤ 括号中评语为恽铁樵所加,括号原文有。标点符号为原文所有。其中有几处需要注意:如“梦耳。[……]无之。[……]媿何梦?”中三个句读在原文中,因是竖排,都放在字的右侧。周遑(鲁迅:《怀旧》,《小说月报》第4卷1号,1913年4月25日)。

⑥ 参见鲁迅《鲁迅大全集》第22卷,李新宇、周海婴主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263。

⑦ 《陈长》和《李荃》的内容字句几乎相同,鲁迅疑为同一



人。参见鲁迅“谢承后汉书”,《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70-71。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巴人“鲁迅的创作方法”,《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Ba, Ren. “On Lu Xun’s Methods in Literary Creation.” *A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on Lu Xun, 1913–1983*. Vol. 2.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Feder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庚辰(鲁迅:“哀尘”,《浙江潮》(东京)5(1903)癸卯五月二十日:165-70。

[Gengchen, aka. Lu Xun. “The Dust.” *Zhejiang Tide* (Tokyo) 15 June, 1903. 165-70. ]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Kiyama, Hideo. *The Literary Renaissance an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Trans. Zhao Jinghu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鲁迅《鲁迅大全集》第22卷,李新宇、周海婴主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Lu, Xun. *The Complete Lu Xun*. Vol. 22. Eds. Li Xinyu and Zhou Haiying.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Press, 2011. ]

——:《鲁迅译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A Collection of Lu Xun’s Translation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

——:《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 *Collected Ancient Books Compiled by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

——:“人生象数”,《鲁迅佚文集》上,刘运峰编。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

[——: “Physiology.” *Lu Xun’s Lost Writings*. Vol. 1. Ed. Liu Yunfeng. Beijing: Qunyan Press, 2001. ]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5. ]

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化书写语言”(下),《鲁迅研究月刊》1(2010):5-14。

[Wang, Feng. “Zhou Brothers’ Early Translation and Modern Written Chinese.”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1(2010): 5-14. ]

王桂妹“‘文言’+‘白话’的特别格式——《新青年》语境中的《狂人日记》”,《文艺争鸣》6(2006):79-82。

[Wang, Guimei. “A Special Combination of *Wenyan* with *Baihua*: *A Madman’s Diary* in the Context of *New Youth*.” *Literature and Art* 6(2006): 79-82. ]

王宁编《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Wang, Ning, ed. *Lecture Notes of Zhang Taiyan’s Exegesis of Shuo Wen Jie 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夏丐尊“鲁迅翁杂忆”,《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Xia, Mianzun. “Some Recollections of Lu Xun.” *A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on Lu Xun, 1913–1983*. Vol. 2.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Feder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Zheng, Zhenduo. “The Compilation for Lu Xun’s Lost Words.” *A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on Lu Xun, 1913–1983*. Vol. 2.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Feder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周遑(鲁迅:“怀旧”,《小说月报》第4卷1号,1913年4月25日。

[Zhou, Chuo, aka. Lu Xun. “Nostalgia.”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4. No. 1. 25 Apr. 1913. ]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Zhou, Zuoren. *Lu Xun’s Old Residence*.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

——:《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Memoir of Zhi Tang*. Vol. 1.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

(责任编辑:王峰)